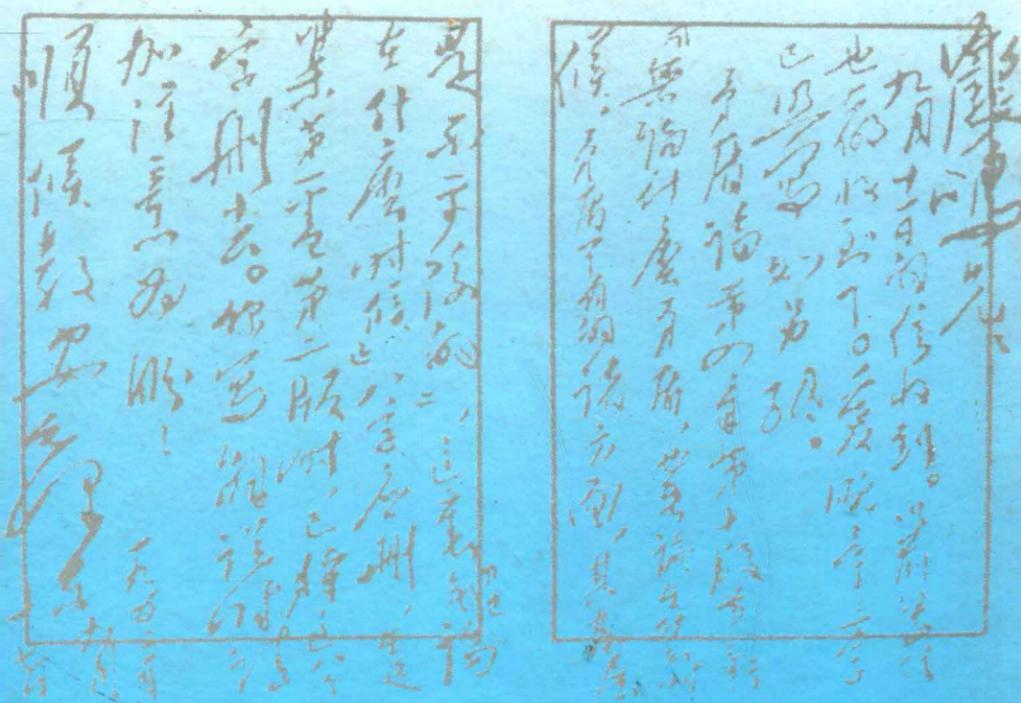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

一代哲人李达



岳麓书社

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

一代哲人李达

岳麓书社

主编：吕芳文 余应彬
副主编：彭慧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代哲人李达 / 吕芳文主编 —— 长沙 : 岳麓书社 ,
2001

(湖南文史资料文库)

ISBN 7 - 80665 - 080 - 6

I. —… II. 吕… III. 李达 (1890 ~ 1966) —生平事
迹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8092 号

责任编辑 武岩

扉页书名题字 刘夫生

装帧设计 武岳将

一代哲人李达

吕芳文 余应彬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飞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4.75

字数 : 385,000 印数 : 1 - 2000

ISBN 7 - 80665 - 080 - 6

G · 223 定价 :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 长沙市德雅路 226 号 邮编 : 410003

《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编委会

顾问：

朱作霖 刘大年 郑培民 刘夫生 刘 正
文选德 陈彰嘉 游碧竹 姚守拙

主任：

田伏隆

副主任：

陈满之 龚汝仁 彭茂吾 文辉抗 郑怡庭
刘林玉 杨保秋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韦杰庭 文辉抗 田伏隆 刘林玉 刘泱泱
张光华 杨保秋 陈满之 周秋光 郑怡庭
范忠程 郭汉民 夏剑钦 龚汝仁 彭茂吾
谭双泉

总责任编辑：

唐浩明

目 录

综述 余应彬(1)

第一编 追求真理 战斗的一生

我所知道的李达先生	邓初民(21)
怀念李达	石曼华(26)
李达青少年时代轶事	文竹月(29)
李达在零陵活动片断	蒋良金(37)
李达回乡轶事	唐曾孝(41)
李达在家乡二三事	杨邦国(52)
家乡人的骄傲	颜若义(59)
李达紫金山上避日寇	张大元(65)
李达与湖南的和平解放	陈力新 李梅彬(69)
李达与程潜起义	欧阳敏纳(71)
李达北京之行	李梅彬(81)
记李达同志二三事	陈学源(90)
李达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真相	石曼华(94)
李达与毛泽东	曾勉之(97)
毛泽东和李达的友谊	陈力新 李梅彬(104)
“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王元慎(109)
李达同志收到毛泽东同志来信的情景	涂西畴(117)
“我到毛主席家饿了一通”	陈明新(121)

综述

余应彬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他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长期坚持革命斗争，长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和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奋斗历程表明他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

李达，又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笔名达、立达、鹤、江春、胡炎、李特、H.M 等。1890 年 10 月 2 日生于零陵县蔡家埠的一个佃农家庭。

李达从小聪明好学，7 岁进私塾，1905 年考入永州中学。

当时，永州中学是零陵、祁阳、东安等湘南 8 县的最高学府，在全省也颇有名气。李达从闭塞的乡间来到这里，眼界逐渐开阔，开始了解到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反帝救国的愿望日益强烈。

1909 年秋，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入学后，他目睹学政腐败，学生们头戴顶子，身穿长袍马褂，向孔子牌位三跪九叩，更加痛心疾首，深感中国之所以受列强侵略，是由于教育落后，科学不发达，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醒人们的觉悟，才能国富

民强。因此，他开始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1911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李达回到湖南。随后，他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深感失望，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破灭，转而接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主张，于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入东京第一师范数理科学习。次年因患肺病辍学回国后，又于1917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

留日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掠夺中国的叫嚣和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特别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奋起斗争惨遭失败，又打破了李达“实业救国”的理想，严重的现实使他“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他仍然感到茫然，“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①。

正当李达因找不到救国的道路而极端苦闷悲愤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如春雷乍响，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以极大的热情，了解到列宁领导“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推翻沙皇专制建立劳农政府，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沙皇俄国变成劳农专政的国家等情况，懂得了“‘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②从此，李达开始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18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发动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反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斗争，李达是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和湖南留日学生代表。5月7

①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13、14期合刊。

② 同①

日晚，他率留日学生先发队乘船回国，于 14 日抵达北京。经数日奔走联络，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等，发动归国留日学生与北大、高师、高医、高工、农专、法商等校学生共约 2000 余人，于 5 月 21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向段祺瑞政府的请愿示威运动。虽因准备不足，请愿示威没有达到目的，但它是我国学运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影响遍及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并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准备。

经过这次斗争的实践，李达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①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 6 月，李达再赴日本，全力以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刻苦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为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欢欣鼓舞，于 6 月中旬及时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寄回国内，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其中，《什么叫社会主义》初步介绍和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等内容；《社会主义的目的》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论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

^①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 年 13、14 期合刊。

本主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端”,“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衡,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的平等状态”。6月20日至7月3日,又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连续在《觉悟》上发表7篇短文,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随后,李达克服各种困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作用是很重要的。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他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中,即将李达所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书籍之一。又如,《唯物史观解说》自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曾重版过14次。

1920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①的目的从日本回到国内,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交换意见后,住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进行秘密建党工作。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他们在《新青年》社举行会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章程草案。在上海发起组的联系和推动下,北京、武汉、南京、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筹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自9月起,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李达参加了编辑工作。11月7日,上海发起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

为了办好《共产党》月刊,李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极大的努力。《共产党》月刊编辑部一直设在李达寓所,最初在老渔阳里2号,后随李达迁到南成都路辅德里225号,设在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内,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都只能秘密进行,经费也

① 《李达自传》(1958年3月)。

没有保证。最困难时,李达甚至独自一人负责从撰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在李达等人的努力下,《共产党》月刊积极向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刊物的发行量高达 5000 份,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共产主义小组都把它列为必读材料。

这段时间,李达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从思想理论上清除建党的障碍,争取那些有爱国、进步要求而一时接受了其他思想派别影响的人,扩展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还在《共产党》、《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大量的论文和译文,对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920 年冬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李达继李汉俊自 1921 年 2 月起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负责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6 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李达、李汉俊与他们一起讨论党的工作,认为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据此,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与李汉俊分头写信给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东京的组织,通知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还通过夫人王会悟,在博文女校借房 3 间,供各地代表住宿。

1921 年 7 月 23 日,经过李达等人的妥善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 3 号胜利举行,李达和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出席了大会。7 月 30 日晚,会议被法租界的侦探发觉后,李达又通过夫人王会悟,于 8 月初将代表们安全转移到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大会最后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来建设中国共产党;选举

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大以后，李达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为了开辟和扩展党的宣传阵地，李达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于9月1日组织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并任主编。他克服人员少、经费缺乏等困难，将出版社设在自己住所，经常独自一人负责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工作，仅用一年时间，即迅速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4种，其他3种。这些书籍，及时地适应了广大革命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中共创办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后，李达还兼任该校校务主任，并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十分关心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的《妇女声》半月刊的编辑出版，不仅为该刊的许多重要文章进行审阅修改，而且亲自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如《女权运动史》、《女子解放论》、《女性中心说》、《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使该刊在提高妇女觉悟，促进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中共二大，是教育问题和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因此前不久已决定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他在会上请求不再继续担任中央宣传主任职务。二大闭幕后，李达离开中央，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11月由沪返湘，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在负责学校招生、学员自修、考察等工作的同时，主要负责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因材施教，经常在一天之内分别为3个班的学员讲课和辅导，并亲自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印发学员。1923年4月，李达还和毛泽东一道创办《新时代》

月刊，并任主编，先后发表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自己写的《何谓帝国主义》、《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民主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关系，统一战线中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和贯彻。

“保持革命之本”

李达自二大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仍十分关心党中央的工作，多次就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1922年冬，当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应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团时，他曾直率地予以反对。1923年夏，又专程从长沙到上海，再次与陈独秀交换意见，表示赞成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党团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但陈独秀固执己见，不等李达说完，便指责李达没有资格作主张，甚至威胁说：“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李达受此刺激，情绪也很激动，针锋相对地回答：“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莽英雄作领袖！”^① 随即，李达到长沙，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同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

李达脱党后，仍与毛泽东等人一道，为办好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而努力工作。

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李达应聘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仍任教授。在讲授唯物史观的同时，他将自己长期研究唯物史的成果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于1926年6月由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的第一部哲学专著，也是中国最早的系

^①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从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出发,对社会的起源、发展、变革和社会意识、阶级和国家、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不少适合于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理论观点。该书出版后,迅速在革命者中间广泛流传,至 1933 年,共再版了 14 次。

1926 年 10 月,李达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次年春,任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委。1927 年 3 月回到长沙,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创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马日事变发生后,他按照党组织的通知,转移到家乡零陵。12 月,由武汉潜赴上海。

李达抵上海初期,国民党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引诱他出任南京卫戍司令谷正纲的顾问,他愤慨地表示:“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①,“一个月给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② 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改组派,他也断然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李达与许德珩、张庆孚、邓初民等发起成立“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自勉,共同在《民众先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③ 他还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与熊得山、邓初民等创办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书籍,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顽强的斗争。

自 1929 年下半年起,李达先后到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任

^① 《李达自传》(1956 年 3 月)。

^② 李心天:《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光明日报》1978 年 12 月 12 日。

^③ 宋镜明:《访问许德珩记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1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第 31 页。

教，并任暨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把大学讲坛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勇敢地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时，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先后发表《社会之基础研究》、《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等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以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积极探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由于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在上海期间长期受到反动当局的刁难和迫害，住宅多次被搜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反动当局甚至趁他在暨南大学讲演时事政治和社会状况之机，派暴徒将他的右臂和右锁骨打断，妄图使他不能写作。但李达在住院近 50 天右手仍不能活动的情况下，坚毅地表示：“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左手一样！”^① 1932 年 2 月，暨南大学借迁校之机，终于将他解聘。

同年 8 月，李达由上海到北平。在进步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先后被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聘为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在朝阳大学兼课。此后 5 年中，李达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讲授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货币学等课程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著述和翻译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

在哲学方面，他写作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两本专著，以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经济学等方面，他写作了《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两本专著，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长篇论文，还与熊得山合译了拉比杜斯

^① 李心天：《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光明日报》1978 年 12 月 12 日。

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与陈家琰合译了河上嗣郎的《土地经济学》。其中，以《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最有影响。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 40 多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李达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根据日本侵占东北，窥视华北的时代特点，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为人们提供认识中国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说明中国的出路在于摆脱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初版扉页上满腔热情地题词：“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李达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造诣，把逻辑的论证和实际的考察结合起来，系统、准确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认识史的批判继承关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实践既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又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并批判了各派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由于该书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要求，出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称它是中国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革命根据地大力推荐过这部著作。

《经济学大纲》是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在该书的绪论中，李达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研究的必要”这个原则性问题，以及在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中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的构想；指出了中国经济现状的“三个相互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并强调，由于“第一过程占据统制地位”，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出路“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

为此,他原计划全书由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苏俄为对象)、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经济(主要以中国为对象)四个部分构成一个巨大而严整的体系,落足点则放在现代中国经济方面,后来由于条件限制,只完成了前两个部分。尽管如此,由前两部分构成的《经济学大纲》也独立成为一部系统的著作,特别是书中对于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经济的论述,以及绪论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不但在当时是一个创举,直到今天也还保留着它的重要理论价值。

1938年2月,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主任,讲授经济学和社会学。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此前,李达曾于1932年5月和1933年5月两次为冯玉祥短期讲学,得到了冯玉祥的高度评价和信任。1939年1月,李达到重庆后,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冯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还代邀黄松龄、邓初民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同时,李达积极促进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同年9月,李达谢绝冯玉祥的诚心挽留,返回桂林。行前,他给冯玉祥留下一封长信,劝冯退出国民党,专做抗日民主运动,并提出了不少善意的建议。冯玉祥读过此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圈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真算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①

在重庆期间,李达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关怀。毛泽东从延安寄来亲笔信,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②周恩来专门派吕振羽代为看望,并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倍感兴奋,不加考虑便答复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

^①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1946年第9期。

^② 宋镜明:《访问武纤生记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0页。

愿去。”^①但随后恰逢周恩来出国治病，董必武也因事离开了重庆，而主持南方局的负责人误认为“只要有碗饭吃”是在讲条件，去延安一事便被搁置下来。李达因此十分伤感，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会失节的。”^②后来，周恩来返重庆得知这一情况，非常气愤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③

李达返回桂林后，因已被解聘而陷入失业的困境，被迫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次年秋虽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但未满一年又被国民党教育部解聘。此后，便长期困居家乡。1944年8月零陵沦陷后，日军大肆搜捕，李达与家人逃亡避难，途中又遭土匪打劫，粮食、衣服，连同他长年写作的手稿和珍藏的毛泽东亲笔信，都被洗劫一空。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活，几次使他几至冻饿而死。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达到回到家乡，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生活极为困难，不得不靠卖油为生。1947年秋，他通过朋友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这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政权更加独裁专制，其特务机关对李达的监视也更加严密，他们通过湖大当局，规定李达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特别指聘李达为法律系教授，不让他讲授熟悉的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李达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进步师生的支持和掩护下，经常参加各类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集会，发表演说，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法学，赶写了他

^①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文献》1980年第4辑。

^②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文献》1980年第4辑。

^③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文献》1980年第4辑。